

王安石文题疑难人名解读八则

寿 涌

(上海市黄浦教育学院,上海 200002)

摘要: 在《临川先生文集》的书信中,绝大部分都有姓有名有官职,所指人物十分清楚。然而有一些标题却难以落实具体对象。这些人士或者是有姓无名,或者是无姓有名,或者是虽然有姓有官职,却不知究竟是指张三还是李四。总之,是我们无法得知这些人士的真实身份。这就妨碍了我们对王安石行实仕履的深入的了解和全面的把握。本文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的相关记载,对其中一些标题的疑难人名进行了试解。

关键词: 王安石;文题;疑难人名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38(2010)05-0071-04

Interpretation of the Eight Pieces of Wang Anshi's Difficult Names in His Article Titles

SHOU Yong

(Huangpu Education College of Shanghai, Shanghai 200002, China)

Abstract: In his letters of Mr. Lincun's Collected Works, most of which have names, surnames and offices, and people are clearly directed. However, in some titles the concrete objects ar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These people either have surnames without names, or have names without surnames or thought have names and offices, we do not know who they refer to, which hides us from deeply and thoroughly understanding Wang Anshi.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relevant records of Xu Zizhi Tongjian Changbian and Song Shi (the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difficult names in some of his article titles.

Key Words: Wang Anshi; article title; difficult names

在《临川先生文集》中,书启之类的交流对象,绝大部分都有姓有名有官职。依据人物的姓名及官职,我们便可以追寻了解对方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以及王安石私人关系的亲密程度,从而做到确切理解文意,全面了解双方的交流需要。然而在部分书启的文题中,也有一些是难以落实具体对象的。这些人士或是有姓无名,或是无姓有名,或者是虽然有姓又有官职,却难以落实到底是谁。总之,是我们无法得知这些交流对象的真实身份。这就造成了文意分析和社会背景探索的困难,妨碍了我们对王安石社会人事联系的深入了解和全面把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曾对其中一些书启文题的疑难人名和相关人士进行了试探,现整理成文,缀成八则,试述如下。

1. 《上相府书》(卷七十四)

关于此书的上书对象,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有一说法:“据子固作《都官志》云:安石知鄞县,庆历七年十一月,上书乞告葬公。明年某月,诏曰可。考是年相府贾昌朝、陈执中也。”然而据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可知,庆历七年十一月时,宰相实为陈执中一人。蔡上翔所考,尚未到位。

众所周知,庆历五年正月、四月时,贾昌朝和陈执中曾先后为相,他们一直共事到庆历七年。据《长编》(卷一六〇)庆历七年三月乙未记事曰:“工部侍郎、平章事贾昌朝罢为武胜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是则庆历七年三月以后,朝中宰相就剩下陈执中一人。所以王安石在庆历七年十一月上书乞告葬公时,所上对象就只是陈执中。

收稿日期: 2010-06-22

作者简介: 寿涌(1946—),男,上海人,教授,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又因为庆历五年四月陈执中为相时,王安石正在扬州判官任上,而此信又是专呈陈执中的,所以王安石在信中特为回忆庆历五年的情况曰:“伏惟阁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时窃官于朝,受命佐州。”这也更加表明《上相府书》的所呈对象是陈执中。

2. 《上凌屯田书(代人作)》(卷七十七)

凌屯田其人在王安石的有关研究中一直未得到考实,所见之说都是把凌屯田注说为凌策,但实际上均误。考凌屯田应为凌景阳。

凌策在《宋史》中有传。《宋史·凌策传》(卷三〇七)曰:“淳化三年……还朝,会命为广南西路转运使,进屯田员外郎。”“天禧二年三月卒,年六十二。”天禧是宋真宗时期的年号,下距王安石的生活年代甚远。此凌策既然早已去世,则其非是仁宗朝之凌屯田可知。

考《长编》(卷一四一)庆历三年五月己巳记事曰:“罢屯田员外郎凌景阳、昭信节度掌书记魏延坚、郑州观察判官夏有章昭试学士院。”其文后有注云:“欧阳修《从谏集》:景阳已就试,改一官,知和州,余并罢。”又《宋会要·选举三一》记曰:“庆历三年五月六日,屯田员外郎凌景阳知和州。”又《全宋诗》余靖有诗曰《送凌屯田知和州》,^[1](P2671)]可见仁宗时期人们亦以凌屯田称谓凌景阳。是则仁宗时期的凌屯田当指凌景阳。

王安石此书文句精洁,风格峭厉,当是早年作品。文中曰:“跋千里之途,犯不测之川,而造执事之门……”文章既是代人而作,又是士子上门求荐语气,则委托者、执笔者和凌屯田三人应同在一地。而究其可能,只有庆历元年秋冬期间才能做到这一点。庆历元年夏,王安石为父守丧服除,赴京赶考。因同行某考生欲上门拜见凌屯田,求助于王安石作此上书,王安石才写下了这篇代人之作。而庆历二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已离开京师赴扬州任判官。庆历三年,凌景阳也离开京师改官赴和州。在这后两年中,王安石皆无可能撰写此信。

故此书当作于庆历元年,凌屯田当为凌景阳。

3. 贺留守王太尉启(卷七十九)

此启标题在《临川先生文集》中作《贺留守王太尉启》,然而在《王文公文集》中却作《贺留守太尉启》,并无“王”字。故有学者注“留守王太尉”为王拱辰,也有学者注“留守太尉”为韩琦。但实际上二者均误。按此启非为韩太尉韩琦所作,也非为王太尉王拱辰所作,而实为文彦博文太尉而作,《临川先生

文集》中的“王”实为文之误。

考辨视角一:从任职的经历看。

文中曰:“恭闻孚号,崇奖耆明,肇建节旌,再司管籥……”此赞誉只能指文太尉。《长编》(卷一八七)嘉祐三年六月丙午记事曰:“吏部尚书、平章事文彦博罢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后元丰年间,文彦博再度以太尉的身份留守西京河南府。《长编》(卷三〇八)元丰三年九月丙戌记事曰:“河东节度使、检校太师、守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潞国公文彦博守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依前河东节度使判河南府。”一前一后,实可谓是“肇建节旌,再司管籥”。

王拱辰于元丰元年才获检校太尉。《长编》(卷二九三)元丰元年十月己未记事曰:“以宣徽北院使、检校太傅、中太一宫使王拱辰为检校太尉、宣徽南院使、西太一宫使,许居京师。”而此前他早在治平年间就已经两判河南府了。考刘敞《公是集》(卷五一)《王开府行状》对此有明确记载曰:“公旧名拱寿,唱第日,仁宗面赐今名。”“治平二年,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明年,检校太傅、宣徽北院使再任。”所以取得检校太尉资格以后的王拱辰并不符合“肇建节旌,再司管籥”的赞誉。是则《临川先生文集》中的标题《贺留守王太尉启》之“王”字显然有疑。

考辨视角二:从情谊的轻重看

文中又曰:“某旧蒙识拔,尚阻趋承,踊跃之私,实为倍百。”考王安石一生仕履之行实,王拱辰于王安石从无“识拔”之恩,则“踊跃之私”自然也就无从谈起。而身为太尉、确有“识拔”之恩的显然只能是文彦博。众所周知,当王安石还只是一个普通的鄞县县令时,宰臣文彦博等就已经看到了他的锐气和才华,特向仁宗推荐,建议甄擢重用。此事见载于《长编》(卷一七〇)皇祐三年五月庚午记事。对此等“识拔”,王安石当然一生都会“踊跃之私,实为倍百”。所以,文中所述的内容,只与文彦博有关,而与王拱辰无关。这一事实也说明了《贺留守王太尉启》之“王”字有疑。

综上所述,此启实为文彦博所作。其写作背景当以《长编》(卷三〇八)元丰三年九月丙戌的记事为准。其写成的时间,当在九月丙戌之后不久。

此启在《王文公文集》中的标题是正确的,而《临川先生文集》中的标题应改从《王文公文集》,或者直接更改为“贺留守文太尉启”。

4. 《贺致政杨侍读启》(卷八十)

“致政杨侍读”少见注说。考杨侍读当为杨偕,

字次公。

据《宋史·杨偕传》(卷三〇〇)所记,杨偕在仁宗时曾擢天章阁待制、河北转运使。后又徙河东都转运使,又任河北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后又迁翰林侍读学士,又改右(按当为左)谏议大夫。“请老,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于其归,特赐宴。”杨偕的这些职务和经历,均与贺启中的颂词一一吻合:“登备谏工,尝已告嘉猷于后;奉将使节,则以下膏泽于民。”“引年去位,循礼得中,唯其养恬,有以镇薄。”又《长编》(卷一六三)庆历八年二月丙子记事曰:“翰林侍读学士、左谏议大夫杨偕为工部侍郎致仕。”足见此致政杨侍读当为杨偕不误。

王安石不仅与杨偕的关系甚好,而且与其长子杨忱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文集上的《答杨忱书》和《大理寺丞杨君墓志铭》,均为其子杨忱而作。

故《贺致政杨侍读启》当作于庆历八年二月,杨侍读即是杨偕。

5.《上江宁府王龙图启》(卷八十一)

学界对“江宁府王龙图”一般均视为王琪,然实为误。据有关史料可以考明,“江宁府王龙图”应为王益柔。

王益柔,字胜之,《宋史》有传。据《长编》(卷二一)熙宁三年五月乙未记事曰:“兵部郎中、集贤校理王益柔直舍人院。王安石谓益柔旧人,且行义修饬不废学问,故与蔡延庆并命直舍人院。”据此,王益柔当系王安石故友。考《长编》(卷一九五)所记嘉祐六年闰八月王安石知制诰时,盐铁判官王益柔曾为契丹正旦使,二人或系彼时相处为友。《临川先生文集》中有《和王胜之<雪霁借马入省>》和《次韵王胜之<咏雪>》二诗,或即作于彼时。

据《宋史·王益柔传》(卷二八六)所记:“范仲淹未识面,以馆阁荐之,除集贤校理。”后又“出为两浙、京东西转运使”。后又“直舍人院,知制诰兼直学士院”。后又“迁龙图阁直学士、秘书监,知蔡、扬、亳州、江宁、应天府。”此仕履经历恰与文中所述“龙图秘阁之奥,使台峻右陝之邦”和“恭审镇临会府”相合。

按所谓“龙图秘阁”即“知制诰兼直学士院”、“迁龙图阁直学士、秘书监”云云。所谓“右陝之邦”则非指任职陝西,而是指王益柔曾任京东西转运使的管辖区域,恰与永兴军路相邻,且在永兴军路之东侧(即地图之右面)。所谓“恭审镇临会府”,即是指王益柔知江宁府。据《景定建康志》记载:“(元丰)六年六月二十日,陈绎移知建昌军。八月五日,以龙

图阁直学士、太中大夫王益柔知府事。七年六月,移知应天府。”^[2](P397)]按会府即天府,唐代以节度使治之,宋代则相当于各路经略安抚使所在地。江宁府系江南东路大府,故王安石在文中称之为会府。此已明言王益柔元丰六年知江宁府时,王安石作此启为贺。

又王安石从未与王琪有过诗文来往,而王安石与王益柔却有四首相关之诗。其中《和子瞻<同王胜之游蒋山>》一诗,作于王益柔由知江宁府移知应天府之时。元丰七年春,苏轼由黄州顺长江东下回到常州之后,曾盘桓于金陵和真州一带。是年初秋,苏轼与王益柔共游蒋山,同访荆公。其时苏轼曾欣悦作诗《同王胜之游蒋山》,诗中有云:“略约(按小桥)横秋水,浮图插暮烟。”王安石看到此诗后,大为欣赏,以至诗兴大发,又作一诗再和苏轼。既然王益柔在移知应天府时特来向王安石告别,这当然也可从侧面说明,二王在江宁的交往是有始有终的;王益柔当初外来移知江宁府时,王安石曾亲自道贺过。

故定此启为祝贺王益柔新知江宁府而写,且作于元丰六年八月,当无疑义。

6.《上信州知郡大谏启》(卷八十一)

“信州知郡大谏”无姓无名,不易探询。但据《长编》有关记载可以考明,此“信州知郡大谏”应为杨察,字隐甫。

据《长编》(卷一六五)庆历八年八月丁丑记事曰:“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杨察落职……察知信州。”北宋文莹《湘山野录》(卷上)亦记有杨察谪守信州一事:“范文正公镇余杭,今侍读王乐道公在幕。杨内翰隐甫公察谪信州,未几,召还赴阙,过杭,公厚遇之。”由此可知,杨察字隐甫。

又《宋史·杨察传》(卷二九五)记曰:“罢知信州,徙扬州。”王安石《信州兴造记》记事曰:“晋陵张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是则杨察在庆历八年八月知信州,第二年皇祐元年即迁徙扬州,而由“晋陵张公”接任。

王安石此启明言知信州者为“大谏”,“大谏”指谏议大夫,此与《长编》记事相合,则“信州知郡大谏”必谓杨察无疑。此启又表明自己正“海滨承乏,宇蔭未趋”,则王氏必在知鄞县之时。

故综上所述,此启应定于庆历八年所写为宜,当为杨察而作。

7.《祭秦国夫人文(为高若讷作)》(卷八十六)

考《长编》可明,秦国夫人实为仁宗之乳母。此

文系王安石替高若讷为仁宗乳母林氏去世而代作。

祭文曰:“上之岐岐,实护于中。”“上用旧德,情之郁结。”此明言秦国夫人对仁宗有过看管和照顾的关系,而仁宗对秦国夫人亦感情深厚。

《长编》里有三条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其一,《长编》(卷九八)乾兴元年夏四月庚子记事曰:“封上(按仁宗)乳母福昌县君林氏为南康郡夫人。林氏钱塘人,大中祥符初,由刘美家入宫。天禧末皇太后内管政事,林氏预掌机密云。”

其二,《长编》(卷一〇六)天圣六年冬十月戊辰记事曰:“进封乳母南康郡夫人林氏为蒋国夫人。”

其三,《长编》(卷一八〇)至和二年八月丁未记事曰:“秦、晋国恭肃贤正夫人林氏卒,上为成服于苑中,辍视朝三日。宰臣率百官诣崇政殿门奉慰。夫人保辅圣躬,勤劳无不至,又多知先朝事,上尤尊遇之。”

综上所述,可见秦国夫人确为林氏,在仁宗幼小时就“保辅圣躬”,且“多知”先朝机密,声名甚高。故林氏去世时,仁宗痛悼,满朝上下也都恭表哀伤。高若讷时为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尚书左丞、同群牧制置使,虽在病中,但是也得奉献祭文,于是就有了群牧判官王安石的代笔之作。

史述秦国夫人林氏卒后数日,高若讷也接着去世。《长编》(卷一八〇)至和二年八月乙卯记事曰:“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尚书左丞高若讷卒。”考八月丙戌朔,丁未为二十二日,乙卯为三十日,则高若讷比林氏晚逝八天。时为群牧判官的王安石,恰有时间和条件完成高若讷的委托。

故此文写于至和二年八月底,为仁宗乳母林氏去世而作,当无疑义。

8.《王文公文集·与柳承议书》(卷四)

《王文公文集》(卷四)有一篇《与柳承议书》,但此文未被《临川先生文集》收录,这里也一并加以考述。柳承议其人,历来无人注说。窃以为柳承议应为柳瑾之子柳子文,字仲远。理由如下:

其一,(清)厉鹗《宋诗纪事》记曰:“柳瑾,字子玉,庆历二年进士。”可见柳瑾乃为王安石同年。又曰:“柳子文,字仲远。”^{[3](P388,711)}(清)王文诰注苏轼《次韵柳子玉见寄》曰:“柳瑾,丹徒人。其子仲远,为中都公婿,公之妹婿也。”^{[4](P208)}(清)查慎行注苏轼《送柳子玉赴灵仙》引苏辙《栾城集》考曰:“以时考之,子玉之歿,当在丙辰、丁巳间。”^{[4](P483)}按丙辰为熙宁九年,丁巳为熙宁十年。则柳瑾的逝世应在元丰之前。此书有曰:“公方护丧归里,应接必多,岂敢费烦厚馈!”故柳子文送丧回乡当在元丰年间,其时王安石已闲居钟山。柳子文回到丹徒以后,则专门向父亲的老友王安石赠礼问好。

其二,元丰三年改官制,元丰五年施行新官制。王安石行文称柳子文为柳承议,正反映了新官制的时代特点。所谓“承议”即承议郎,它相对应于旧官制的左、右正言、太常博士以及国子博士。柳子文的这一官职更加清楚地表明:王安石此信必作于元丰五、六年间。

参考文献:

- [1]全宋诗:第四册(卷二二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2]景定建康志:第488册(卷一三)[M].台北: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3]宋诗纪事:第1-2册(卷一五、卷二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4]苏东坡全集:第1册(卷六)[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邓刚